

沈昌文 著

也無風雨也晴



海豚出版社

沈昌文 著

也無風雨也晴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也无风雨也无晴 / 沈昌文著.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10-2132-8

I. ①也… II. ①沈… III. ①沈昌文-回忆录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5052号

本书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海豚出版社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 发行、销售地区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不包含香港、澳门地区、台湾地区。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14-4586

封面题字: 庄因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张 镛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16开 (680毫米×940毫米)
印 张: 20.25
字 数: 280千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110-2132-8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沈昌文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一九五一年三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工作。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一九八六年一月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一九九六年一月退休，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继续为出版事业奔走忙碌。

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等。

目 录

第一章 二十年上海生活

- 3 “棚户”里的“小赤佬”
- 9 “银楼”里的小伙计
- 12 成为了小“仆欧”
- 15 地下共产党的小崇拜者
- 19 漫无目标的自学生涯
- 22 对文化的兴趣和妄图钻进三联书店
- 25 当年的三联书店
- 30 冒牌大学生
- 36 在上海二十年生活的回顾

第二章 从校对开始的翻身

- 41 四十个月的校对生涯
- 44 阶级斗争和健康斗争的第一课
- 48 翻身记
- 52 “名存实亡”的三联书店
- 58 “急用先学”和得遇明师

63	在反右派风暴里的自我丑化
67	炼钢战士和话剧明星
72	为“反修”做后勤
78	开始结识“废物”

第三章 “文革”中的记忆

85	印象深刻的“夫人同志”
88	想不到火会烧到自己身上
91	想办法活下去
95	到农村去
98	回京，混入“批林批孔”的革命队伍
103	批斗作者——“文革”中的一大快事
105	稿费——“文革”期间的一大纠纷
107	“文革”中某些书的殊荣
109	林彪事件的影响

第四章 “二主”之下的一把手

113	新领域里“二主”下的一仆
116	党支部书记、一把手……
118	大胆的举措
122	《读书无禁区》及以后

129	“哪壶水不开提哪壶”和“跪着造反”
133	厚积薄发，行而有文
144	无能、无为、无我
151	来自上层不知因由的关照
154	范用所提的“自治”
157	竭诚为读者服务

第五章 十年总经理

163	恢复三联书店
168	五朵金花
172	知青政策的因祸得福
174	办公室里的红烧肉
176	往海外开拓
185	“向后看”
191	台湾这块“试验田”
196	朱枫的故事
198	《文化：中国与世界》
201	在外地的开拓
204	盖大楼，找接班

第六章 “退休”后的天地

- 211 最后的恩怨
- 213 “将错就错”的牺牲品
- 216 恢复光明以后
- 219 “新世纪万有文库”
- 222 新《万象》
- 227 “书趣文丛”和《吕叔湘全集》
- 230 不良于行而工于“跃”的郝明义
- 233 朱德庸和幾米

第七章 “脉望”的故事

- 237 嗜“臭”成癖，喜“肥”成性
- 240 为兴趣而读书
- 242 邓丽君和季姐
- 245 在“潜水”中讨生活
- 248 防止“被遗弃”
- 250 茶余饭后逛北京
- 252 与老人惜别

结 语

- 257 天天还在想“知道”

后 记

- 261 秘书、书房与气功——沈昌文访问记

附 录

- 291 附录一：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
299 附录二：胡愈之：关于创议兴办“群言堂”的一封信
304 附录三：沈昌文生平及相关历史、出版大事年表

第一章

二十年上海生活

『棚户』里的『小赤佬』

我的父亲是上海大场地方人。大场据说就是现在上海大学所在的地方，可是我没去过。祖父出身大概是大场的一个农民或者地主，我说不清楚；祖母出生于大场附近，一个叫庙头的地方。

祖父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做厨师出身，后来经营“包饭作坊”。当年上海的上班族越来越多，上办公室送餐的行业发展起来，那时把这行业叫“包饭”。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开“包饭作坊”以前，据说在一家著名的中学——民立中学做过总务工作。后来听说同中学的领导闹得不太愉快，也不知什么原因。民立中学是苏家私人创办的，现在在上海还挺有名。据说我姐姐当年进不了那中学，祖辈为此生气已极，因此一定要督促我进入别的好中学。

祖母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很长时候是她管“包饭作坊”的业务。在上海，开“包饭作坊”据说一定要同黑社会有勾结。不然，你的工人肩挑菜、

饭在市里走，有可能被乞丐抢夺。所以，据说祖母一直是个小有名声的“白相人⁽¹⁾嫂嫂”。我还记得，小时看见她某日穿得衣着鲜明，说是要出去“吃讲茶”，这次她是去解决人家的婚姻问题，是离是合，全凭她的“闲话一句”。

可能由于祖母太能干，父亲一直做大少爷，没法继承上辈的事业。他十三岁就抽鸦片，毕生一无作为。我问祖母为什么让他抽鸦片，她说当年流行的观念是：抽鸦片的孩子不变坏，比如不嫖不赌，这就能够把我们的家产保持下来。我父亲的确是不嫖不赌，可是也从来不做事情，整天抽鸦片，直到二十九岁去世，那时我才三岁。

我不知道父亲长得怎么样，只知道他叫沈汉英。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是他去世的时候，我在灵堂上哭，别的全不记得了。父亲去世没多久，我们全家就逃亡了，因为出乎我祖母的意料，父亲所负的债已经超过我们家所住的房子和店产所值，只得逃亡，留下房产抵债。我跟妈妈逃到宁波她的娘家，祖母和姐姐逃到山东烟台，我的姑妈家（爸爸有两个妹妹，小妹夫在烟台工作）。

我补说一句，我爸爸和妈妈怎么会结合？我外祖父是宁波人，来上海经商，成为祖母家的房客。父亲和母亲就在那个宅子里结的婚。母亲告诉我说，她是结了婚才知道老公是抽鸦片的。十三岁就抽，结婚的时候也就二十岁多一点，已经抽了很多年了。

我们逃到宁波，住在外祖父的老家。住了一年回到上海。在宁波的一年

(1) 白相人，旧上海俚语，相当于现在说的流氓。



沈昌文（六岁）

光景，我人虽小，收获倒是不小。主要是，我的外祖母天天教育我怎样做宁波人。她总是赞扬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宁波人。她鼓励我长大后去做“刚白多”（“买办”的音译）。她用宁波话说，“刚”就是“讲”，“白”是“白白地”，“多”是“拿”。那类人靠讲讲话就能白白的拿钱，所以是最好的职业。我后来才知道，“刚白多”者，comprador 的宁波发音也。怪不得，在我外婆心目中，最伟大的“刚白多”，是“阿德哥”（虞洽卿⁽²⁾）。这可以说是我最早受到的启蒙教育。

不久，祖母也从烟台回到上海。她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又借钱开了一个米店。没多久，米店倒闭。于是我们就变成流浪人了。我祖母在那个店关了门之后在附近租了一个现在的话叫“临时建筑”的小房子，那时叫“棚户”，就是马路边上用木板钉的破烂房子。住到棚户里，我倒算是“落叶归根”了。我在那里住了五六年，天天在那破旧的木板房子的板缝中看这个世界。按上海话说，我只不过是个“小赤佬”，但家里大人觉得我们家是败落的大户人家，不许我跟附近的穷孩子在一起，只能一个人从板缝中看世界了。

这个时候我大概六岁，要上学了。开始在附近一家宁波人办的学校上了几个月的学。学校很差劲，祖母坚决反对。祖母说我们是好人家，好人家的孩子必须受好的教育，不跟坏孩子在一起。我们周围住的都是工人和小商贩子弟，他们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些，因为他们好歹还有收入，但祖母绝不允

(2) 虞洽卿，上海帮会领袖，人称阿德哥。浙江镇海人。出身贫寒，曾读私塾。一八九五年起，历任德商鲁麟洋行、荷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辛亥革命曾捐助军饷。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与日方合作，于一九四一年赴渝。卒于重庆。



沈母

许我同他们交往，叫他们“野蛮小鬼”。祖母找她的亲戚，就是我二姑妈的婆家，他们家有人是上海“工部局”的文员，上海话叫“大写”。工部局实际上是英国人统治上海租界的政权机构。工部局职工在他们开办的学校读书可以免费。于是我改名叫王昌文（原名沈锦文。这一家姓王，孩子的排行为“昌”，因改如此），冒充他们家孩子入学。学校的名称叫“北区小学”（现在叫“康乐路小学”），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我从来没穿过西式衬衣，为了要进这个学校，妈妈连夜给我用针线缝了一件衬衣。我从此更不跟邻居交往，只跟学校里的同学交往。我在这个小学里念了六年，从一九三七年一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学校用现在的语言讲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强调英语，但也有一些著名教育家在那里，例如陈鹤琴⁽³⁾先生、葛鲤庭先生、章印丹先生。学校教育的确很好，我在里面假冒有钱人家孩子，天天跟有钱人家的孩子一起念书。我必须成绩好，才能保证继续学习。

还没到毕业，一九四二年底，上海给日本人占领了，英美人都进了集中营，来了日本老师。英语不学了，开始学日语。很意外，新来的日本年轻女老师对我很好，所以我学日语非常勤奋。

顺便说说，当时李香兰他们唱的流行歌曲中有控诉鸦片祸害的内容，这也对我起了作用，使我对日本人有好感，因为我受母亲教育，十分痛恨鸦片——这里可见日本人当年的宣传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我小学毕业，但上不起中学，怎么办？当时北区小学透露给

(3) 陈鹤琴，一八九二年生。教育家。提出活教育理论，重视科学实验，主张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要适合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呼吁建立儿童教育师资培训体系。编写过幼稚园、小学课本及儿童课外读物数十种，设计与推广玩具、教具和幼稚园设备。一生主要从事于一系列开创性的幼儿教育研究与实践。建国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二年去世。

我有一个机会，有一位上海有名的绅士，叫沈恩孚⁽⁴⁾，一九四三年八十岁生日，收了些礼金，他把那些礼金办成奖学金。我经过小学老师推荐，得到了他一年学费的资助。恩孚先生的儿子沈有乾⁽⁵⁾先生那时是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的领导，记得当时还把我找去专门谈话，恳切勉励我好好学习（半个世纪后，我才知道有乾先生是知名的旅美学者。我很高兴后来自己在大陆出版了他的著作，但那时他大概已作古了。恩孚先生的幼子沈有鼎，恰恰又是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我也为他出过书）。

这时我也考取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恢复姓沈，名就不改回来了。我进去的时候当然已经是日本人统治下了，但学校还十分重视英语训练。英语老师是牛津毕业的，叫丁文彪。语文老师也非常好，是一位小说家，叫陈汝惠⁽⁶⁾。我在中学初一念完，到初二，奖学金没有了，家里怎么也筹不出钱来。那时我妈妈在当保姆，我姐姐找到一个工作是做火车站里边的播音员，都没多少收入。所以初二下半学期念了不多天，连上学期的学费都欠缴，就在学校“失

(4) 沈恩孚，一八六四年生，字信卿，江苏吴县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早年就读于上海龙门书院，后执教于宝山县学堂。一九〇四年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任龙门师范学堂监督，主张变法维新。一九一三年主持江苏教育，主张体育、童子军、新教育等理论、方法。民国六年与黄炎培等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筹创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武昌起义后入江苏都督府，任副民政长，旋任江苏省公署秘书长。一九二二年“二次革命”后弃政从教。创办鸿英图书馆。又任上海市议会议长。抗战期间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一九四九年四月病逝于上海。

(5) 沈有乾，一八九九年生，字公健，江苏吴县人。心理学家、逻辑学家和统计学家。三十年代曾致力于学术小品和随笔的写作，作品散见于《新月》、《论语》等刊。著有《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论理学》、《现代逻辑》等。

(6) 陈汝惠，一九一七年生，上海宝山人。一九三二年毕业于省立上海中学乡师，一九三四年起任上海立德中学初中语文教师。爱好文学，业余开始写作。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向《申报·自由谈》《译报·前哨》《文汇报·学林》投寄杂文，并出版有儿童文学作品《我们的新生活》等。

踪”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我的妈妈通过她的姑父介绍，把我送到一个银楼当学徒了。

在家庭十来年的教育下，我已初步形成几个观念：

一、痛恨鸦片，因为它是家道中落的根源。

二、讨厌上海人，喜欢宁波人。这是母亲几乎每天教导我的，因为她认为自己最大的失误是嫁了一个上海人。她认为上海人好吃懒做，不如宁波人勤奋。

三、时刻记住自己是“好人家子弟”，不跟穷人家的“野蛮小鬼”交往。

第二点，等到自己做了宁波人商店的学徒后更加强了。第三点，几乎影响了我几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起来，一九六六年中，有人专门写了一张系统揭发我的大字报，说我是假工人，实际上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这么写，可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